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二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九期 ——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2b）

【往事如烟】	救赎	叶志江
【亡灵祭坛】	张东荪一家的恐怖遭遇	王友琴
【千秋功罪】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小 夏
【往事追忆】	砸“八·一”大会	戴维堤
【难忘岁月】	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梁守福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往事如烟】

救赎

• 叶志江 •

美国大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讲的是一个青年才俊蒙冤被判了两个终生监禁，在狱中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的故事。

十年文革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如同一个无形的肖申克监狱，上演着种种救赎的故事：为自身，或为他人；为自由和美好的生活，也为灵魂。

我在文革初虽然遭受过匪夷所思的折磨，但让我真正感受到进入了这个无形监狱却是在我犯了炮打康生的“滔天大罪”后。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在清华工字厅的一间小屋里阅读文革期间多如牛毛的红卫兵小报时，北京大学红卫兵印发的一份关于一九六四年“北大社教”（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资料吸引了我。

犹如历史长河中一个诡异的政治旋涡，从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到大学校长和教员，许多人的政治生命都在北大社教事件演变、翻转的过程中浮沉。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以北大社教运动为背景的。

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直接卷入了大字报出笼和发表的过程。在北大社教期间和文革初期，康生有过多处涉及社教运动的主要人物陆平、常溪萍和聂元梓的讲话。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忽而支持陆平、常溪萍，忽而又将自己打扮成反对他们的英雄。当我将他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说的话加以比较后，我突然感到康生是一个两面三刀，文过饰非的阴谋家。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和“白云黄鹤的地方”看了数天材料后悟出了一句至理名言：“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在“工字厅的小屋”里看了数天材料后决定“跳”出来写一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

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工字厅是清华园中一个古建筑庭院，园中曲廊迂回，树木扶疏。据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前曾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最后一夜。

人们无法知道，工字厅的最后一夜是否给了王国维自沉的启迪或暗示。我在革命的洪流中几遭灭顶的纵身一跳倒确实是在工字厅这间小屋里得到了某种“灵感”或“诱惑”。

当然，如毛泽东所说，这和我的某种“本性”也应当有关。

文革初期，康生负责中央党校的运动。

当我忽发奇想后去中央党校调查康生的问题时，我并未意识到我将因此而进入无形的“肖申克监狱”，面临十年的厄运。

时值隆冬。中央党校门可罗雀，院中人迹稀少，几张残破的大字报在寒风中摇曳，仿佛刚遭受过一次洗劫。正当我为无从了解党校的情况而颇感失望时，迎面走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女孩子。

也算是命中注定，女孩子正是康生治下的一个“叛逆”，十分乐意帮我调查康生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三十名男生和十五名女生。这批学生大多是颇有背景的高干子弟。

岁月流逝，我还依稀记得女孩子的音容笑貌，却早已忘记她的名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她是党校青训班的学生，父亲是军队干部。

女孩子风风火火，立即带我去见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遗孀王丹一女士和艾的秘书卢国英。艾思奇是深受毛泽东器重的哲学家，他的《大众哲学》一书培育了众多共产党人，文革前夕英年早逝。

康生在中央党校培植亲信，支一派打一派。卢国英作为党校红战团的一个负责人，当时正遭受康生支持的党校红旗队李广文，武葆华等人的压迫。

谈话时，我明显地感觉出王丹一和卢国英心情沉重和对康生不满。卢国英同我谈了党校的问题所在和康生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但一再表示他们不会公开反对康生。

我很理解卢国英这一谨慎态度，毕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女学生帮我约见的第二个人是她的青训班同学，海军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这苏承德是中央党校里敢于公开反对康生的人。因为怕被抓，已处于“地下状态”。

在一间窗户遮得十分严实的房间里我见到了苏承德。苏戴着鸭舌帽，帽沿压得很低，大概是怕被人认出来。他机敏而又滑稽，口无遮拦，有问必答，对康生的种种劣迹显然有深入的了解，这和他的家庭背景应当有关。虽然是在“密室”，他还是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我的问题，一边东张西望，仿佛康生在党校的爪牙会随时冲进来将我们一网打尽。

苏承德十分高兴有人出来公开炮打康生。他说：中央党校的人都已噤若寒蝉，但清华的学生有资本和胆量向康生公开挑战。

这一番话让我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搞了个“抢救运动”，伤害了很多，党内有很多高级干部对康生侧目而视。苏承德又说：康生喜欢附庸风雅，欣赏齐白石的画而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鲁赤水，平时好题字作画，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黑线人物往来密切。邓拓曾写文章赞扬鲁赤水的画。

平心而论，康生虽有奸臣相，但书法功底十分了得，真草隶篆样样皆能，画也可登大雅之堂。中国历史上像康生类型的人，大概先秦酷臣李斯算是第一个。自宋明清以来，蔡京、秦桧、严嵩等也均以奸臣之名加精通书法而著称。

邓拓赞扬康生字画的文章并非溜须拍马之作。

苏承德认为按照文革时候的标准，康生的这些字画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他特别提到邓拓和中调部部长孔原，说可以从这两个人的家中找到康生的字画。

苏承德的这个主意可称作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邓拓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人物，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一些谈论风月的文章都被作为反党的黑话而全国共讨之。假如人们突然发现邓拓居然在《燕山夜话》中写文章吹捧鲁赤水的画，又发现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本人也有不少疑似黑话黑画的作品，那岂不妙哉。

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我的下一步行动便是寻找邓拓和孔原两家的地址，去搜寻康生的黑字画，用作炮打康生的“物证”。

邓拓的女儿邓小岚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的学生。她得知我炮打康生的行动后主动跑来找，秘密地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到她家“踩点”。

半年多前，邓拓不堪“全国共讨之”的压力而自杀身亡。邓小岚身处逆境，却不畏风险参与炮打康生一事。那是十分令人感动，但在当时也是必须严守秘密的。

邓小岚赞成炮打康生自有她的切身感受。当她父亲的《燕山夜话》被指为黑话连篇时，她

难以理解家中挂着的那些康生字画何以能清白无辜。她说，康生书赠她父亲的一幅字“月如无恨月常圆”不同样流露出一种阴暗心理吗？

我大喜，康生的狐狸尾巴果然露了出来。面对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康生居然怀恨在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联想未免有点幼稚可笑，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不仅是邓拓的《燕山夜话》，我的《鬼大夫救鬼秘方》也是这样被革命群众联想为反革命大毒草的。（注一）

寻找孔原家的地址颇费了一点周折。

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他的夫人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儿子孔丹在北京四中就读。一九六六年冬，孔丹和一批高干子弟组织了“西城区纠察队”和“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西纠”和“联动”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后，孔丹遭到拘捕。孔原，许明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被江青点名诬陷为“西纠”干坏事的后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两人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结果许明死了，孔原被救活。

我向一些高干子弟打听孔原家的地址，但无人知道。我突然想到，孔原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应当知道孔原家的地址。

乔冠华是一个才华出众和经历颇为传奇的外交家，他的儿子乔宗淮和我是同系同年级的同学。文革初期，乔宗淮因担任数力学系文革临筹的负责人而遭受批判。

我设法找到了一个外交部的电话，接我电话的是外交部传达室的人。我向他说明我是清华大学的，有重要事找乔冠华。他推说他不知道乔的电话，但在我的坚持下，只得将我的电话转给了他的上司。

我如法炮制，电话被转了三、四次，接电话的人都不敢轻易挂断声称有重要事情，并以清华大学学生名义打来的电话。

那时候，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青年学生一个个都仿佛成了天兵天将，四出“火烧”、“砸烂”，谁也不敢怠慢。

最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乔的声音：“我是乔冠华”。

我压制住成功的激动，告诉乔冠华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要求他转告乔宗淮回清华做检查。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搬出乔宗淮的名字，不过是借此证明我确是清华学生，而“做检查”云云也只是为了“正式谈判”前给乔冠华一点心理上的压力。

大名鼎鼎的“乔老爷”居然不知道我用的是“声东击西”的计谋，在电话里一再承诺会做他儿子的工作，并对我的通情达理表示感谢。我随即切入正题，要求他告诉我孔原家的地址。乔当然知道孔原自杀一事，慌忙辩解他和孔原没有关系。他说国务院外办和外交部不是一个系统，他不知道孔原住的地方。

我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并没有怀疑他和孔原有牵连，但我们有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孔原的住址。在沉吟片刻并和他的秘书交谈了几句后，他告诉了我孔原的住址！

一九七一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乔冠华以外交部部长身份出任首位中

国代表团团长。他在联合国大会上仰天大笑的照片传遍全球，那是何等的风度和自信。但在文革这种特有的环境中，即令乔冠华这样的资深外交家，竟然也会轻信一个从未谋面的青年学生，在电话中泄露一个重要官员的住址。可见人们在那个时候有多大的精神压力。

在搜查孔原家时，室内陈设之奢华和孔原夫妇两人自杀后凌乱的卧床引起了我很深的感慨。在这有限的空间中，人的命运以极具震撼力的反差形式展现在我的眼前。当同去的学生被满屋子稀奇的洋玩意儿和摆设所吸引时，我申明纪律：除了书报字画，其它一切物品都不准触动。没有一个人违背这条纪律，大家都知道这次“抄家”的目的和严肃性。当然，“一饱眼福”还是允许的。

我们找到了几幅字画并拿走了几本杂志。我将所有取走的物品写了一份清单，并签了名。当我将清单交给孔原的亲属，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妇，并请她清点物品时，她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们的文明态度和拿走这些字画的用意有点好奇。

一九六八年，中央调查部的人拿着那张清单来找我，我如数交还了所有物品。来人告诉我，这是他见到的唯一的抄家的人留了清单并将物品保管好的。

尽管这次抄家“事出有因”，尽管抄家过程“文明”，事后也将抄走的物品“完璧归赵”，但这毕竟是一种侵犯人权，无视法律的行为。文革时期，“打、砸、抢、抄、抓”盛行，其中的“抄”便是指“抄家”。四十多年后回顾此事，确有汗颜之感。

邓拓的家已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占领，他们将它视为私人领地，不准他人染指。我们无缘一窥“月如无恨月常圆”的意境。

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被北宋文人曼卿对以“月如无恨月常圆”，一时传为绝对。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毛泽东踌躇满志，挥笔写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九六五年七月，毛还致信陈毅：“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康生当然知道毛泽东偏爱李贺的诗，他给邓拓题写“月如无恨月常圆”无非是投圣上所好。我们兴师动众，大做文章，未免浅薄幼稚了一点。

数十年后，康生的字画被辗转拍卖，我留心着网上有关的报道，但至今未见这幅字的踪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和一月十九日，我先后贴出两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这第二张大字报贴出时，清华园里已是一片“炮”声了。

在我起草的大字报上署名的除了同班同学孙常秋和陈国光两人外，还有刘泉。刘泉在大字报上署名实属意外，而在日后却代我受过。

刘泉和我都是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文革初，他因反对工作组而全校闻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领导冒雨参加清华全校大会时，曾亲自为蒯大富和刘泉平反。在我的印象中，刘泉虽是高干子弟，但十分朴素随和。刘比我低一级，但他的宿舍和我相邻。我将大字报写好后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端着饭碗笑嘻嘻地走进我的宿舍。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愿意签名。不料他看完我写的大字报后不加思索便签上了他的名字，并给大字报拟了一个标题：“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说他早就怀疑康生是坏人，但称康生为同志可以留有余地。

后来我们被批判处理时，“康生同志”并没有因此而领情，给我们留下什么余地。

一月二十二日，陈伯达给蒯大富打来电话，严词指责清华大学学生炮打康生一事。刘泉因他的“井冈山兵团二号人物”地位成了大字报的罪魁祸首，并因此而一生坎坷。

我的“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的玩笑话曾使陈育延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注二），我的“愿不愿在大字报上签名”的玩笑话又使刘泉蒙受了多年磨难。

人生真是玩笑不得。

公正地说，这同当时清华大学越演越烈的派性斗争有关。

在炮打康生一事被镇压后的一天，我在大礼堂前看大字报时遇到日后成为四一四派“一把手”的沈如槐。他搂着我的肩膀说：“和我们一起反老蒯吧。”

我受宠若惊，指着他们那些批判蒯大富和刘泉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说：“可是炮打康生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呀。”

沈的回答颇具政治家的风度：“我们的矛头是针对蒯大富和刘泉的，我们不排除其他炮打过康生的同学。”

文革中有一句名言：“派性掩护敌人”。看来我便是一个被派性掩护的“敌人”，尽管我后来也并没有逃脱“炮打康生”带给我的厄运。

虽然炮打康生一事对全国的政局并无任何影响，但对清华大学的文革进程却至关重要。我无意评判清华两派的是非恩怨，四一四派的很多政治主张在今天看来确有其“必胜”的道理，但蒯大富和刘泉参与炮打康生一事无疑为沈如槐等四一四派领袖们积聚反对蒯大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当北洋政府撤了蔡元培北大校长一职时，满清保皇派、北大教授辜鸿铭拖着长辫子从妓院赶回学校，在北大教师的抗议书上签上他的大名。他说：我不管你们的抗议书上写了什么理由，我的理由就是保皇。蔡元培是校长，校长就是我的皇上。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文革时期的造反和辜鸿铭的保皇有着同样的逻辑：谁掌权便造谁的反（或保谁的皇）。清华党委掌权时，造党委的反；工作组掌权时，造工作组的反。轮到蒯大富掌权，成了“蒯司令”，他也就成了炮轰的目标，造反的对象。

无论是他目无中央“智擒王光美”，还是胆大妄为“炮打康生”，当时都被反对他的学生一阵猛轰。

而掌了权的蒯司令也如同镇压过他的工作组一样，视反对他的学生为“托派”、“反革命”，必欲除之而后快，最终攘成武斗，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文革中的那些事儿往往扑朔迷离，后人只能以“成败论英雄”。当年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谭力夫后来成了反对中央文革的英雄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文革那段历史是不能深究的，否则，英雄的脸谱上也会被人发现涂有令人可笑的油彩。

文革初期曾出现过一些零星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北京清华等校学生炮打康生是第一起集体炮打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事件。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和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复旦、交大等校学生两次炮打张春桥成为第二起集体炮打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事件。由于卷入人数众多，这两件事对个人命运产生的影响也就广泛而深远得多。

当北京的学生因炮打康生而遭受磨难时，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胡守钧等人因炮打张春桥而身系囹圄。

七十年代中，我去上海拜访了“胡守钧小集团”的三号人物、“黑桃皇后”邱励欧。在溧阳路上一间还残留着上海滩旧日建筑韵味的屋子里，历尽磨难的黑桃皇后依旧风姿绰约。当她呷着咖啡，用细软的吴语讲着市井传闻时，我完全无法将她和各种小报上描绘的那个出谋划策的女将联系起来。她喜欢文学，祸从“笔”出，胡守钧一案便是从她的那些通信中找到“突破口”的。

晚年的邱励欧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Erie）湖边，孤寂一人，听着淙淙的雨声回首往事时，不免涕泪纵横，吟诗填词悲叹“人生苦旅本飘蓬”。

一九六八年底，当我面临毕业分配时，工宣队给我作了“犯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严重政治错误”的毕业鉴定。在那个年代，这顶吓人的帽子是足以将我投入大狱的。感谢工宣队“给出路”的政策，我得以分配工作，但如曾昭奋先生所言“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我被送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半后被正式分配到四川省雅安一个化肥厂工作。接待我的是雅安地区大学生分配办公室的一个干部，在得知我在清华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时，他先是惊愕，继而十分诚恳地安慰我说：化肥厂的管道里都是“流体”，你的专业会有用的。

其实，我当时关心的并不是专业对口的问题，而是如何应付头上那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离开清华后的十年中，我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无论到哪里，我都逃避不了被审查或批斗。来自清华和党校的“外调”公函如同恶梦一样挥之不去。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发现，在我的“档案袋”里各种关于我炮打康生的材料居然有一寸多厚。

沉重的“历史包袱”促使我继续关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舞台。我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康生的垮台上。文革后期的党内斗争使我完全相信康生的问题会有暴露的一天。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倒是康生过早死掉而被盖棺论定。

一九七四年我调到武汉一所大学工作。次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正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发，忽然听到远处收音机里飘来哀乐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几个字，我立即就明白康生死了。康生参与过中苏论战，“反修战士”是他头上的一项桂冠。

那是我十年中最感沮丧的一天。

“四人帮”刚倒台时曾盛传“康老临死前揭发张春桥和江青历史上都是叛徒”。这个传闻也让我心凉了好一阵。

康生和“四人帮”狼狈为奸，这本是不争的事实。“四人帮”的倒台让我看到了康生的末日。岂料他临死前还能预知未来，试图将自己和“四人帮”撇清，真不愧是老谋深算。

我从怀疑康生“两面三刀、文过饰非”始，十年后又一次见识了他生平最后一次“欺世盗

名”的高超技俩。

一九七八年，这个恶贯满盈，早已在党内遭人侧目而视的弄臣终于难逃遗臭万年的下场。同年，清华大学将我的档案“召回”，销毁了那一寸多厚的炮打康生“罪证”。

炮打康生使我磋砣十年。但我和刘泉等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贴出第一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后，清华园里从者如云，许多人卷入了炮打康生的行列。俗话说“法不治众”，我和其他炮打康生的清华学生后来的遭遇并不悲惨，至少我们没有遭受肉体折磨或牢狱之灾。但北京市其他高校和中央党校的大字报大多是在一月二十日后贴出的，在陈伯达一月二十二日打电话给蒯大富后便无人跟进了，因而这些学校中炮打康生的学生十分孤立，在派性催化下，他们的遭遇要悲惨得多。

苏承德因炮打康生被关押多年，受尽折磨。文革后获得平反，并出任金禾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等人时多次点了卢国英的名，称他是坏人。卢国英惨遭毒打和拘捕，最终未能逃脱炮打康生带来的厄运，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文革后，卢国英教授继续从事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著述颇丰。

我不知道那个女学生后来的命运。四十年后，我在网上看到了甄小英的名字，那十五名女生中的一个。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军队干部。更巧的是，甄小英也因介入了六七年一月公开炮打康生事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经历坎坷。我遇见的女学生和她即使不是同一个人，也应当有相同的命运。甄小英历经磨难后成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在理论界享有盛誉。

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叫樊立勤，文革中反“老佛爷”聂元梓反得颇有名气，也很有骨气。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在北大贴出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被聂元梓一派的学生抓住了把柄。先是在校园里游街批斗，施以拳打脚踢，后来又被关押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不肯屈膝投降，被人用铁钉钉入他的两个膝盖，使他成了终身残疾。他和邓朴方等十多个北大学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集团。邓朴方在遭关押毒打后，不堪凌辱，跳楼致残。文革后，听说共同的命运使得樊立勤一度成为邓朴方的座上客。

二〇〇七年初，樊立勤在网上发表了他给邓榕（毛毛）的一封信，谈及他在文革期间的磨难。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炮打康生一事，他在信中写道：

我在清华召开了各系被整学生座谈会。会上，多数人都说，北大的事情没法办，聂元梓是毛主席支持的，……。我最后决定，康生支持她，支持她写大字报，又支持抓人，那就认定康生是她的后台。我拍板，就打康生。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16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就这么打响了。

樊立勤的遭遇十分令人同情，他的骨气也让很多人钦佩。然而，十六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却不是因为樊某人的“拍板”而打响的，他的这段回忆有违历史事实。

顾名思义，“打响”应当是指第一枪，但我和刘泉都没有参加过他召开的座谈会，而且在他“拍板”之前就已经“抢跑道”将大字报贴出去了。樊立勤本人的大字报也是在清华大学出现反康高潮后贴出的。

顺便提及一点，我不仅没有参加过樊立勤召开的座谈会，也没有参加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戴国珍等人组织的“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我的大字报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和当时任



何群众组织都毫无关系。

我后来得知，清华和中央党校里有不少人当时也在酝酿对康生发难。不仅蒯大富这一派的学生中很多人反康生，反对蒯大富的学生中也有人反康生。因此，我当初的个人行动得以在短短的几天中便引发十多所高校的连锁反应。

炮打康生事件前后历时仅五、六天，旋即被中央文革强行制止，在高潮迭起的文革大剧中，只能算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多年后康生的垮台也和这一事件并无太多关联。

然而，康生毕竟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顾问、政治局常委，四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研究者们对于这件在康生生前向他公开发难的往事倒也不乏兴趣。（注三）

当我记载这段往事时，并非要证明我有什么“火眼金睛”，能在文革初期便识破康生这一类妖魔鬼怪。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鼓舞下，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的影响下，当年青年学生“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事例比比皆是。自毛泽东以下，几乎党内每个高级干部都被“炮打”或“火烧”过。

就我个人而言，除了炮打康生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将刘少奇被贬一事公诸于世后，我在八月二十日前后贴出的另一张大字报《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也曾有过非常高的“点击率”。四十多年后，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还从美国来信告诉我：

至今，我可以“还原”当年你贴那张大字报的动作和神情：十多个人从第一张贴好后就站着不动了，当你从七、八尺高的梯子上下来时，围观的人就成几十位了……。

这张将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人的大字报虽然曾让我遭到北京中学红卫兵一个多月的追杀，但在十年文革中倒是安然无恙。

一九七八年，当康生被批判而刘少奇即将昭雪时，清华校友屈耀双和我开玩笑：“看来你的两张大字报中，‘错误’的那张（炮打康生）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正确’的那张（炮打刘少奇）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无论政局如何变动，我的“命中率”都只有百分之五十，这和扔钱币猜正反面的几率相同，绝无可以炫耀之处。

值得人们钦佩的是那些在文革初期便看清它的荒谬本质并起而反对的人，如“二月逆流”中大闹怀仁堂的老帅们和民间的许多英烈。

而我同多数国民一样，文革初期如醉如痴地投入运动，炮打康生也不过是对文革的一种投入，绝无反对文革的意思。直到文革折腾得天怨人怒后我才有所觉醒，那已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所幸的是出于良知和崇尚思想自由，虽然友人中反对文革的“异端邪说”不绝于耳，我从未出卖或诬陷过任何人，又因手无缚鸡之力，也就失去了“打砸抢”一类建功立业的机会。

回顾这段历史的本意不仅因为它是清华文革“真相”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它曾殃及许多人日后的命运。

那些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而投身文革运动的青年学生因这种难以捉摸的“命

中率”而一生遭受厄运恐怕是百分之百不公正的。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保险赔偿案例：一对夫妇因轮胎爆裂而遭车祸身亡，轮胎公司以超速为由拒绝赔偿。辩护律师反驳说，对超速的惩罚只是数十美元，而不是死刑。这对夫妇的亲属获得了巨额赔偿。

在中国，许多人仅仅因为“超速”一类的错误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后一生坎坷。

注释：

一.《万象》第十卷第十一期，叶志江：《“救鬼”》。（见本刊 z k 0 8 0 8 d）

二.《万象》第十卷第八、九期合刊，叶志江：《“救美”》。（见本刊 z k 0 9 0 1 c）

三. 美国人约翰·拜伦（John Byron）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ck）在他们的专著《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有一段记载：

第一次公开的挑战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清华大学里出现了许多反对康生的大字报。人们聚集在一起，阅读这些大胆的文字：“康生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刽子手、大两面派，是两手沾满鲜血的酷吏。”……“康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康生不是治世之能人，而是乱世之鬼雄。”……

外国人评论中国人的事难免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相比之下，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回忆》（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更侧重事件演变的脉络：

1月21日，清华井冈山联合高级党校“红战团”，天津大学“8·13”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由清华28团《烈火》战斗组的戴国珍起草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在这之前，1月18日，叶志江、刘泉等四人联名写出《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的大字报，并刊登在当天的《清华井冈山通讯》上。

1月22日凌晨2点50分，中央文革马上做出反应。陈伯达、关锋亲自出马，又是打电话，又是写条子，严厉批评蒯大富。陈伯达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蒯答：知道。）你们的态度怎么样？（蒯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顾问，是中央信任的。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同中央文革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是反动的。不能与他联系。

沈如槐虽然是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但他在回忆录中多次将同日期有关的数字搞错。我的大字报是一月十七日贴出的，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清华井冈山通讯》上。我事先并未将稿子送交《清华井冈山通讯》，他们是不太可能当天就刊出的。

沈如槐的文章倒是确认了在这次炮打康生的事件中，我是“始作俑者”。《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是在清华园和北京市出现的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康生并产生影响的大字报。

一月十九日我又以《117独立营》的名义贴出大字报《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117”是大字报《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贴出的日期，而取名“独立营”则是想表明我炮打康

生的行动和任何群众组织无关。

康生对我的第二张大字报倒是有过公开的答复。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接见红卫兵时说：

后来卢国英到你们那去了，造了许多谣，说我是谭立夫的后台，我根本没见过谭立夫，电话是林枫的老婆搞的鬼，她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告诉谭立夫就给我打电话，我不在，我爱人接的，他说要见我，我爱人拒绝了。

我已不记得是谁“造的谣”，我的大字报应当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一月二十日前后，清华学生炮打康生事件波及北京十多所高校，中央党校有人写了《康生同志，我们也怀疑你》的大字报，甄小英也贴出她炮打康生的大字报《康生质疑 X 问》。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半年以后，康生在中央党校的亲信，曾参与镇压炮打康生运动的李广文突然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贴出他个人签名的大字报，号召打倒“大野心家、阴谋家和刽子手康生”。

~~~~~

## 【亡灵祭坛】

### 张东荪一家的恐怖遭遇

• 王友琴 •

张东荪，男，1886年生，知名政治学教授，1949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968年1月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

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7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在“秦城”，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个特点。

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宗炳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 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反对的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

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  
**【千秋功罪】**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 小 夏 •

自延安整风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仅有刘少奇、彭真、林彪等人，还有周恩来。相对于其他人，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责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为他一向严格控制着不让自己在宣传上显得突出，因此人们对他这方面的问题或是缺乏了解，或是未予重视。

一、周恩来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的首创性

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周恩来常常是走在别的领导人前面的。

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就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301、305页）。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笔者所见资料中，周恩来是最早这样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使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吹捧，却不了解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说：“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这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的首次公众讲话，就最先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他说：“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在说到中共三年来的成就时，周恩来说：“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强调：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1943年8月2日。1943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随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中共能够“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周恩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周恩来在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时候的讲话。《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周恩来这个讲话中有关“毛泽东领导我们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的说法，在篡改历史方面也是走在其他人前面的。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主题之一就是“学习毛泽东”，这是最早公开号召全国学习毛泽东的记录。周恩来声称：“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毛主席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的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31—345页；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328页）

这是在中共还未执政、还在反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之时就向全国青年介绍、宣传并倡导学习自己这一个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讲话。

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再一次提出：“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50页）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毛泽东进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国几十

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段长期遭到诟病的讲话：“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讲话的这些意思，周恩来早已在四年前的讲话中说过了。不同的只是，一、周恩来更极端，他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话前面说的是：“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二、周恩来用了贬损自己的说法（“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来反衬毛泽东的伟大。而这正是周恩来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三、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更早，实际上对林彪及其他领导人后来的表态起到了引导、启发、示范的作用。

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也照样讲了与林彪相类似的话，他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收藏 七千人大会资料，油印本）

这个讲话在官方编纂的《周恩来选集》中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所熟知的林彪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林彪在1966年提出的。然而早在1962年，周恩来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在3月2日，周恩来对此问题还特意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6页）周恩来说：马列主义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9页）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42页）然而，周恩来在此前的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周恩来在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同时，据王力的回忆可以推断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周恩来主持搞的（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41页）。《公报》中就明确宣布：“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年9月26日，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来的眼里，毛泽东远胜斯大林。周恩来说：“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6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周恩来在8月份的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在清华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此类语言，在周恩来的文革讲话中不胜枚举。

林彪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提倡“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送给工作人员，作为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工具。（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1979年版第43页）

过去在批判林彪时，曾批判林彪说过的这句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林彪的发明，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66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当时值班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冯征回忆说：这样的评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于是冯征亲往林彪驻地苏州打电话求证。结果却被告知，“一句顶一万句”是林讲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领导讲的。（蓬莱《“一句顶一万句”出笼前后，1992年10月《书刊导报》）据笔者多方了解，这“另一位领导”就是周恩来。

在批判林彪时，还常常说他篡改历史，比如把自己吹嘘成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等。其实，这些篡改历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为，而究其根源，却能发现周恩来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比如，在对南昌起义的历史阐述上，周恩来就是一个地道的“变色龙”。

1957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展览提纲时，提纲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怀念周恩来》编辑组《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为“反冒进”作检讨之后，1959年，江西省话剧团进京会演《八一风暴》，周恩来指示：听说戏里写了我，不要写我，要写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八一起义。（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87页）

到了文革中，周恩来的说法有了更大的变化。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说的是：“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戴维堤《逝者如斯》，发表于互联网上。笔者采访戴维堤时求证过此事。）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林、毛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1966年12月19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5）》，笔者私藏本；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恩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7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第90页）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悬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年版第439页）

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歌舞《东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亲自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18页）

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2页）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1965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大歌舞《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

为配合当时毛泽东向世界输出革命的决策,《东方红》火热上演的同时,其第二部也在策划中。主题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内容计划描写建国之后的建设和生产。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已创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华时,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华夏文摘增刊610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43期,2007年11月7日出版;帙明《周恩来导演东方绝唱——〈东方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2期)但是后来因为形势变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质,大歌舞《东方红》就是一个充满个人崇拜并经艺术谎言刻意包装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产物。

在文革中,在广大群众之间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绝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的上映,周恩来挥臂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众中深入人心。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来宾在哈尔滨访问时,作曲者王双印演唱了此曲。周恩来听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词曲,然后正式推向全国。

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1964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声音,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8页)

据另一回忆: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立即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17页)

还有回忆称:周恩来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1979年版第257页)

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74页)

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对于其他的歌颂毛的歌舞演出也是下大工夫给以关注和指点的。广东省歌舞团人员追忆,周恩来在观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时指出:第六段中的“红太阳照亮了粤海”,这样说“太小了太轻了”,“何止照亮了粤海,大概你们从广东出发吧?这样就太小、

太轻了。”（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198页）

### 三、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行为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而显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年伊始，因为“反冒进”问题，周恩来从1月份的南宁会议到3月份的成都会议，从“离右派50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对检讨稿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后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59页）

周恩来在检讨中批判自己：“‘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亦可参阅何云峰《个人崇拜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彭冲突》，《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20卷第6期；罗平汗《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

1958年4月25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75页）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48页）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9年版第398页）

周恩来贬损自己，不仅是在语言、文字上，还经常表现在行动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行云《聂元梓谈周恩来》，华夏文摘增刊第38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22期，2004年7月6日出版）

在文革结束后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而写下的这类回忆：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62页）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2页）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 下》，1977年版第388页）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结束语

1958年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一干中共党内要员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论及，唯有周恩来还被描绘成是一直对个人崇拜风气进行批评、抵制、纠正。但是透过对历史的审视，周恩来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是不亚于刘、林等人的。

~~~~~

【往事追忆】

砸“八·一”大会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1967年春、夏，在反击“二月逆流”和“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中，北京出现了一股反总理的逆流。以大学里的几个思想极左的学生组成的“516”兵团，给周恩来贴了许多大字报。社会上一些人建议废除“八一”建军节，立秋收起义（9月9日）为建军节，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人领导的。

对此，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八一”在前，“秋收”在后。是“八一”首先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会议组织者邀请了有关中央首长出席，周总理来了，江青等人不知为什么没有到会。

北航红旗派了六百人参加会议。韩爱晶说，今天这个大会不是我们组织的，什么人都有，成份比较复杂，要求我把人马安排在主席台下面，保卫好主席台。

大会发言一开始，我就听出苗头不对。

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这时，会场上不断有人高呼“砸烂‘八·一’！‘秋收起义’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时我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总理非常激动和气愤。谁都知道，“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人领导的，这次大会明显的是对着周总理来的。我心里顿时为周总理捏了一把汗。

果然，几个发言者调子皆大同小异，主张立“秋收起义”为建军节，废除“八·一”建军节。这时会场上乱起来，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要抢话筒。大会组织者不知是谁，一个劲地要大家安静，但会场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文革中，凡有中央首长参加的大会，从来没有这么乱过。我立即通知北航红旗的学生们把住两个出入口，防止意外。

实事求是地讲，北航红旗也好，韩爱晶也好，都是保总理的。韩爱晶常说：“周总理是全国的大管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是支持我北航红旗的。没有周总理，全国就乱了套了。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反对周总理。”这是历史的事实。至于我个人，始终对周总理非常钦佩，又加上总理亲自为我平了反，即使从个人利益上说，我也绝对是死保总理的。

我们同意参加这个大会，是为了纪念秋收起义，但没想到有人要砸“八·一”。我们事先不知发言者和组织者的目的和宗旨，否则，北航红旗不会参加这个大会。我心里直埋怨韩爱晶。

这时韩爱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台上，看到会场很乱，他们也害了怕。我看到韩爱晶走到周总理面前，不停地同总理讲着什么。大概是向总理解释什么还是劝总理离开会场。据后来韩爱晶说，他是请示总理要不要拒绝参加这个会议，立即离开会场，总理没有同意。

这时，大会组织者请总理讲话。

总理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开始讲话。会场静了下来，韩爱晶和蒯大富紧紧地站在总理身后护着总理。

据我所知，凡是参加这种大会，总理的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都不可能站在主席台上，一般也没有必要。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走下金水桥，乘敞蓬汽车从红卫兵人群中穿过，没有任何危险，但今天我为总理捏了一把汗。今天大会不是我们组织的。我仅带了六百个人来，万一出现情况，有人捣乱，上万人一乱起来，不好控制。我也真想让总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总理的声音有些嘶哑和颤抖。

“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事先我不知道，我是紧急赶来的。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非常好的，我坚决支持这个会议。坚决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

这时会场里突然有人喊：“周恩来下去！我们要见江青同志，我们要见毛主席！”会场顿时又乱了起来，一些人的狂叫声压倒了总理的声音，他们不让总理讲下去。

我大吃一惊。文革以来，我可说什么场面都见过，唯独没碰上过这种场面。这不是公开反总理吗？这还了得！这算他妈的什么造反派？大会组织者和叫喊的人是一些什么人？若这个会在北航召开，我定会让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把他们全抓起来，可这里是工人体育馆，不是我们的天下。

我立即让北航红旗六百名学生全体起立，组成了人墙，把主席台包围了起来，为了镇住一小撮人，我叫人把北航红旗的大旗举了起来，并带头高呼“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北航红旗坚决拥护周总理！”“反对周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我一喊，北航学生和会场上的群众也跟着我喊起来，一下子把一小撮人的气焰压了下去。当时，我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我身上带着枪，如果有人胆敢上去揪斗周总理，我一定敢开枪打死他，别的，我顾不得了。在保总理问题上，我决不含糊！周总理继续讲话，出乎我意料，总理下面的讲话令我大失所望。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不知史学家们怎么看待这些话。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由于我没法看到总理讲话的原始录音（可能没有录音），仅凭记忆，上述总理的讲话可能略有出入，但几句关键的话确凿无误，撕开了衬衣绝对是历史的事实。我和许多人被惊呆了，会场上群情激奋。“誓死保卫周总理！”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人愤怒地谴责一小撮人反对总理、破坏大会的行为。主持大会的人见没法再开下去，便草草收场。顿时，人群拥向了主席台。

说时迟，那时快，我带着北航红旗的学生们冲上了主席台，把周总理紧紧地保护了起来，并护送着总理退场。

那天负责警卫的卫戍区的战士们已手足无措，他们可能未遇到过这种场面。面对体育馆内外人山人海的群众，他们近不了身，干着急使不上劲。我几百名北航红旗学生护卫着周总理，成千上万名群众围着我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移动。我没有受过警卫业务培训，也不会武术，但我知道，这种场面什么也用不上，只靠我20多岁小伙子的身躯和一颗红心护卫着周总理。我面对着总理，向后倒退着，指挥学生们开出一条走道。我对着一个当兵的大喊：“快把总理的车调过来！”我当时急于要把总理护送上汽车，让总理尽快脱险。

现在不记得当时在场的卫戍区负责人是谁了，是傅崇碧，李钟奇，还是其他首长？我估计他们当时也吓坏了，怨我不恭。

关键的问题是人群中有反总理的坏人。

周总理的“大红旗”慢慢地从人群中开了过来。我正要护送总理上车，不料总理不肯上车。他向人群不停地挥着手，点头微笑，不停地同人们握手。伟大的周恩来，他此时的心情我明白，他不愿这样灰溜溜地走掉，他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相信群众，他不相信有人会害他，但作为我们，作为总理临时的保卫人员，我却不能不高度警惕，以防万一。这时，我看见远处卫戍区部队的战士们一队一队地开了过来，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这时，周总理大声地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怕嘛！毛主席说要相信人民群众嘛！我周恩来问心无愧，我不应该害怕群众嘛！现在天快黑了，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他朝陪同的卫戍区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搞一点吃的来，我和大家就在这里吃一点晚饭怎么样？”大家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周总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外围是官兵们和人山人海的群众。不一会儿部队送来了大木桶盛着的稀饭、馒头之类，总理要了一小碗稀饭，我也要了一碗，陪总理喝了起来。

就这样，公元1967年9月9日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门外的马路上，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们一起喝稀饭，并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我和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我敢说，古今中外历史上，除了越王勾践身陷敌手后为了东山再起而卧薪尝胆外，周恩来此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怪周总理去世后联合国破例为他降半旗致哀，他的人格征服了全世界。

文化大革命中，北航红旗犯了许多错误，我也不是白璧无瑕，这点，我从不否认。但是，起码在对待周总理，保卫周总理方面，我们问心无愧，无可指责。

文革中，北航（不光北航红旗）没有一个人反总理。文革中红卫兵的形象，不单是军装皮带加皮鞭的形象。历史就是历史，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点，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当事人，都应尊重历史，而不应胡说八道。

~~~~~

## 【难忘岁月】

### 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十章：“浪遏轻舟”，标题为编者所加。）

批林批孔因何搞起，它不像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舆论准备工作。批陈、批林已经搞几年了，没有什么新鲜话题，群众对此已无兴趣。从批林突然与批孔联系起来，至少我当时感到没来由。我记得最早的发端是“走后门”的问题，什么“后门兵”、“后门工”等等。以后突然批起了“中庸之道”，还有一篇份量比较重的文章叫《孔丘其人》，这篇文章的出现，有些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又要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

这场运动又是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为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谁也不愿意



再当保守派了，大火一下就蔓延起来，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势。因为毛泽东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样的话。从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算起，到七四年已有七年多的时间，群众作这样的理解无可厚非。但这次运动目标并不明确，只好参照六六年的“经验”，炮轰省委总是没有错。但也有人把“孔丘”、“周公”这些见诸报端的话与周恩来联系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但这在当时不占主流思潮。主流思潮是要揭以李德生为首的安徽省委、省革委会的盖子。一时间，合肥又是大字报满天飞。由于李德生、宋佩章等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军队的，林彪一直主持军委工作许多年，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群众把批的矛头指向李德生、宋佩章等是很自然的。结果省委的工作很被动，加上地方革命领导干部有了六六年的经验教训，谁也不敢说半句压制群众的话。常委中的几个青年干部除郭宏杰外，其余无实权，也不能站出来说话。有点实权的郭宏杰是农民出身，又是李德生培养的，他的大字报比李德生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宋佩章又想到我和其他几个青年代表。大约是七四年三月中旬，宋佩章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问我对形势有什么看法？省委怎么做比较好？

我当时主要建议省委常委要分担子，不能大会、小会都是你一个人讲话。常委中的王有香、吴从树等他们也可以说话。他们讲，群众有意见，你可以出来转弯子；你讲话，群众不理解，把矛头指向你，谁来给你转弯子？总不能叫李主任来吧？这样，你说话越多，群众意见越大，反而更乱。宋插话说：“我让他们站出来讲，谁都不站出来，我有什么办法？”

我接着说：“那你尽量少讲话，群众运动失掉了靶子闹不长”。宋佩章认为我的建议很好，但他做不到。听到不同意见，就要顶，而且在大会上与群众顶牛。这样安徽的局面更乱，派性也开始抬头。这次派性抬头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没被“三结合”的部分造反派头头同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之间产生矛盾。在他们看来，被结合的都是被招安的宋江式的人物。我们这些被结合进“两委会”的头头说话没有力量，而且有的还成了革命对象。合肥的局面官方控制不了，民间也无权威控制，不像六六年的局面。街头上出现：“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来的大标语。但由于周总理在群众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受到多数群众的抵制，至少我在“两委”成员中，在一部分群众中就多次表示过：“如果这次批林批孔运动是打倒周总理，我就解甲归田当农民。总理辛辛苦苦为革命一辈子，连个亲生子女都没有，最后落个被打倒的下场，政治有什么干头，不如当农民。学陶渊明终身不从政。”

七三年底，由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从北京军区调到沈阳军区任司令，但仍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总政治部主任也未免去。在批林批孔期间，总政的不少传闻也传到了安徽。什么李德生是“大军阀”、“李德生吹捧林彪”之类的消息。当时批林批孔又是打着毛主席发动并领导的旗号，为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我和李胜利、曹在凤等人联名写了几份李德生的大字报。尽管大字报中没有什么重要内容，但在当时条件下，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其实这件事我很快就感到后悔，我后悔并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做人的原则。李德生处处保我，多次为我说话，我怎么可以跟风落井下石呢？实在感到愧对于他。所以，在七五年元月召开四届人大时，李德生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看安徽代表，我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去看他。因为我这个代表就是李德生在周总理那里为我争取的。但李德生并未因为我的过错而不高兴，他让其他代表去喊我，说要看看我。我带着非常愧疚的心情去看他。我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外，李一定要我到 he 面前去。我觉得这一刻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受的一刻，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在去会议室拍纪录片的路上，他把我拉在他的身边，问我在那里工作，没等我回答，宋佩章就回答说：“省电子局副局长。”李只是“嗯”了一声。这一声“嗯！”对我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李德生为他扯起的风帆打了结。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mailto: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